

鲁迅小说的空间意识探析

吴翔宇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 鲁迅小说的空间意识具有现代品质。物理空间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地域方位,而是作为文化建构和价值体系的一种有效方式,维护和确证着现实合法性的社会秩序。相同和相异两种话语对话的中断和不融合现象,表征了主体的心理空间存在着极大的双向隔膜和话语排斥。其意义的扩充本源于时间与空间的交互影响以及通过空间的多维层次关联来洞悉历史文化本质。

[关键词] 鲁迅小说;空间意识;物理空间;心理空间;时间空间化

[中图分类号] I2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2)03-0127-06

On Space Consciousness of Lu Xun's Novels

WU Xiangyu

(School of Literature,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 Hua, Zhejiang, 321004, China)

Abstract: The space consciousness of Lu Xun's novels constructed a modern time quality. The sense of physical space is not a simple geographical position, but rather as a cultural construct and value systems of an effective way in order to maintain and confirm the legitimacy of the social order of reality. The phenomenon of interruption and non-integration of two dialogues of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characterizes two-way divide and discourse exclusion of huge psychological space. An expanded version of its significance stems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time and space as well as through space, multi-dimensional level of correlation to the nature of insight into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Key words: Lu Xun's novels; space consciousness; physical space; psychological space; interaction of time and space

“空间”是考察社会文化变迁和历史进程的重要维度,规约着人们生存实践的心理结构。可以说,如果能解开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人们生活模式所潜隐的空间结构,则可以从很大程度上破解这些群体的生命存在的基本走向,从而能深刻地把握其生存的基本样式。鲁迅小说中的“鲁镇”“未庄”“临河土场”作为一个个独特的空间生态,浸润了作家深厚的文化记忆,参与其文化想象和价值建构的体系之中。具体而论,物理空间、心理空间、文化空间构成了鲁迅小说中空间结构的三个重要组成要

素,它们的冲突与互动勾联了文本内部的精神意义,彰显了鲁迅复杂而深邃的精神发展历程。

一 作为文化建构与价值体系的物理空间

鲁迅曾将传统社会的空间形态做了精当的比喻:“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1]。“在这样‘不留余地’空气的围绕里,人们的精神大抵要被挤小的”^[2]。于是,“碰壁”“推”“踢”“爬”“撞”“横站”等状态也就成为人的空间体验。鲁迅小说的场景多发生在衙门、

收稿日期: 2012-01-26

收稿日期: 浙江省政府“之江青年社科学者”杰出人才计划资助课题(ZJQN2011T5-3);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1AZD066)

作者简介: 吴翔宇(1980-),男,湖南平江人,浙江师范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公堂、监狱、刑场、神庙、社庙、土地庙、土谷祠、寺院、尼姑庵、祠堂、客厅、街道、十字路口、酒店、茶馆、药铺、饭场、坟场等空间。其主导的空间基调和氛围黑暗且阴冷：“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横梁和椽子都在头上发抖；抖了一会，就大起来，堆在我身上。”（《狂人日记》）“太大的屋子四周包围着她，太空的东西四面压着她，叫她喘气不得。”（《明天》）“但今天铁的光罩住了陈士成，又软软的来劝他了，他或者偶一迟疑，便给他正经的证明，又加上阴森的催逼，使他不得不又向自己的房里转过眼光去。”（《白光》）“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笼罩全市镇。”（《祝福》）“见天色已是黄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在酒楼上》）这种空间呈现形态给人的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在这里，空间不仅是一种方位参照体系，还是一种价值反映体系；不仅是人物活动的场所，而且还作为一种文化情境参与了叙事。

与此相关的是，《呐喊》《彷徨》中展开故事情节的时间点主要设置在“深夜”或“冬季”。这种时间点静态地呈现了鲁迅小说空间意蕴的文化形态，值得关注。《风波》的故事情节起因于“晚饭时候”的一场“风波”；《药》以华老栓在后半夜走在黑沉沉的街上去买“药”为故事发展的关节点；《一件小事》中的“我”在刮着大北风的一个冬日为了生计坐上了一辆人力车；《故乡》中的“我”是在深冬里冒着严寒、阴晦的天气、劲吹的冷风回到我苍黄天色下萧索的、没有一些活气的故乡；《阿Q正传》中阿Q向吴妈求爱、被抓、丁举人向赵家转移财物、赵家被抢是在晚上；《白光》中的陈士成是在初冬的晚饭后发疯、夜里溺死的；《祝福》中的祥林嫂死在除夕夜；《在酒楼上》中的“我”与吕纬甫分别于满天雪花飞舞的黄昏；《长明灯》里“疯子”在暮色中被关进昏暗、静寂的社庙；《伤逝》中涓生是在寂静和空虚的破屋里，在“昏暗的灯光”下写下了自己的悔恨和悲哀……鲁迅为什么要将故事放置于这样的时间点上呢？主要因为这些时间点隐喻了一种悲凉黑暗的氛围，与强大的空间一起，构成了“非人间”的时空体。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讨论社会“结构化”时，尝试将空间概念作为研究人类生活模式以至社会形成的结构因素。按其说法，“场所可以是屋子里的一个房间、一个街角、工厂的一个车间、集镇和城市，乃至由各个民族国家所占据的有严格

疆域分界的区域”^[3]。人在具体的生存实践中利用空间的不同方式或手段，直接决定了空间的文化特征。在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中，有形的空间位置的秩序是与无形的文化身份、价值秩序联系在一起，成为意识形态话语权力和规范人言行的重要载体。《孔乙己》开篇介绍“咸亨酒店”格局时道出了空间位置与身份的关系：靠柜外是站着喝酒的做工的人和短衣帮，而店面隔壁的屋子里则是坐着喝酒的穿长衫的，身份在空间位置中合理配置、秩序井然。《阿Q正传》中赵、钱两家的宅第显然是权势和地位的空间象征，阿Q等无名人物是不能也不敢轻易进出的，小说写到阿Q“用手摸着左颊，和地保退出去了”“钱府的大门正开着，阿Q便怯怯地趑进去”的情景很能说明这一问题。鲁迅小说中处于上层阶级的乡绅（如四爷、鲁四老爷、赵太爷、赵七爷等）是乡土社会结构中一个很独特的组成部分，他们拥有话语权，是“主—奴”社会体系中的“主”的隐喻。对此，鲁迅说过的一句话很能说明问题：“我们的乡下评定是非，常是这样：‘赵太爷说对的，还会错么？他田地就有二百亩！’”^[4]因此，赵太爷可以剥夺阿Q姓赵的权利；四爷可以与其他人商量押解“疯子”；赵七爷经常援引历史掌故来恐吓乡民，他“一路走来，坐着吃饭的人都站起身”等等。在这种文化空间里，奴性人物的主体精神和“人”的尊严被剥夺，他们“现在”意识停滞和逃逸也就不难理解了。

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小说所呈现的空间形态与黑格尔有关中国（东方）社会停滞的论述有共通的地方，黑格尔认为中国是“仅仅属于空间的国家——成为非历史的历史”^[5]。在鲁迅的意识中，这种文化空间中的“主”和“奴”都没有时间性，只有空间性：鲁四老爷、赵太爷、赵七爷等人没有时间性，是因为他们只想利用环境（空间秩序），不想改造环境（空间秩序）。阿Q、祥林嫂、陈士成等人没有时间性，则是因为他们只想适应环境（空间秩序），最终只能被环境（空间秩序）所改造。正如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所说：“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与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的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就是

他的不可能性。”^[6]这种集体记忆形成强大的思维定势,剥夺了主体修改和涂抹自己以往记忆的认知自觉,要超越既定的空间秩序意味着背叛,而这种背叛所滋生的心灵重负势必会动摇主体的行动和思维意识的生成。然而,国民没有具有现代理性意识,缺乏自觉的理性认知。在面对现实空间秩序的挤压时,他们不能调节和整合自己的空间意识。主体的情绪、想象、体悟和话语在这种矛盾的张力场中受到极大的分裂重压,在具体的生存语境中,记忆和主体的行动之间只能产生实用性、本能性的关联,国人只能无奈地去适应而不是去反抗,在没有怀疑和否定的永恒常态中艰难地获取自我的生存保障,确立自己的社会定位和人生选择。

二 对话中断和理解隔膜的心理空间

外在物理空间背后文化意义的认识,为我们对主体的心理空间的思考准备了条件。这种心理空间与上文所述的物理空间一起,是鲁迅启蒙和“立人”工程的重大阻碍。在“古训所筑成的高墙”的“隔膜”中,人和人之间的心理空间是彼此疏离和排斥的。有论者指出:“‘立人’是鲁迅一生战斗的主要目的,而‘破’则是他‘立人’的主要手段,且其在‘破’上的建树远高于‘立人’,‘破’多‘立’少,‘破’深‘立’浅,巧于‘破’而拙于‘立’”^[7]。鲁迅曾用“沙漠”或“厚障壁”等意象来隐喻这种陌化空间。就鲁迅的小说而论,“文化反抗者”“上层压迫者”“下层庸众”是文本中三种相异的主体,他们之间的对话表呈了心理空间的文化特质。由于对话的双方都有一套自足的话语系统,都打上了主体意识的话语“密码”,所以当两套相异的话语碰撞时,对话交流常常以“中断”收场,“双向隔膜”的话语排斥力就产生了。因此,随着对话的时间进程的中断,对话的理解和意义也就自然离场。

从启蒙的角度来看,“下层庸众”是“文化反抗者”启蒙的主要对象,文化反抗者的话语优势、知识优势会在对话中凸显出来。因此,文化反抗者通过对话来完成启蒙行为并不是一件特别艰难的事情。但在鲁迅的小说中,情况远非如此简单。在这方面,《狂人日记》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小说并置了两个话语体系——“狂人”癫狂的话语体系与“常人”的话语体系。在“常人”看来,“狂人”是个“疯子”,所以他说的话打上了“疯子”的标签和语码,“常人”没有必要也没有兴趣去相信一个“疯子”的胡

言乱语;而在“狂人”看来,“常人”所做的与现代理性精神是相悖的,与他的思想也是格格不入的。在这种“双向隔膜”的当下境域里,对话变得难以持续和进行:当狂人质问一伙小孩子,他同他们有什么仇,何故眼色同赵贵翁一样,脸色都铁青时,“他们可就跑了”;当狂人要老五对大哥说他闷得慌,想到园里走走时,“老五不答应,走了”;当狂人问20岁左右的年轻人“吃人的事,对么”时,他言不及义、顾左右而言他地说:“你真会……说笑话……今天天气很好”;当狂人再质问他“从来如此,便对么”时,“这人便不见了”。通过“命名”,狂人成为常人的异己,因此,在常人铲除异己的过程中,他们使用了压制声音的“驱巫”手段,目的是“不让周围的人同他交流,让周围人对谗妄病人的自由呼喊、高亢表演无动于衷,保持缄默”^[8]。所以狂人的“救救孩子”等的呼声也只能通过“独白”、退回内心的方式来表现。

就“文化反抗者”与“上层压迫者”的关系而论,两者是直接对立的,上层压迫者最反感和害怕启蒙的呐喊和主体的反抗,因为它能使被压迫者意识到自己的主体精神,不愿意继续无条件地侍奉主人,主体用自己的生命意识、生命力、生命意志去拥抱和创造空间,通过自己行为的冲击去获致时间的意义和存在。因此,上层压迫者会不由分说地对文化反抗者进行戕杀,对话是很难进行的。《狂人日记》中“我”对以大哥为代表的“吃人者”进行“劝转”,但得不到回应;《祝福》中“我”和鲁四老爷之间的对话,同样并不顺利,“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于是不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书房里”。

在传统观念中,上层压迫者与下层庸众是主子与奴隶的关系,他们对话的进程、结果、意义恰是身份合法性的印证。由于身份相差悬殊,对话过程变得非常艰难。《离婚》很好地诠释了这一问题,爱姑见到七大人后,从“有话”到“无话”,从“有声”到“无声”。无疑,这其中高高在上的强势话语的重压起作用:七大人说的第一句话是“来兮”,这句体现权势和学识的文言言语,对读书不多的爱姑来说,既陌生又受震慑,“不明确的用语拥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它们是藏在圣坛背后的神灵,信众只能诚惶诚恐地来到它们面前”^[9]。她的感觉是:“心脏一停,接着便突突乱跳,似乎大势已去,局面都变了”,在全客厅“鸦雀无声”的氛围中,七大人代表着“权势”和“淫威”的“屁塞”同样发挥着震慑人的

作用,爱姑原要在七大人面前与丈夫和公公“对簿公堂”的一肚子话立刻无影无踪。

除了展现三种不同话语对话的“中断性”外,鲁迅还细腻且深刻地洞见了同一主体内心两面对话的“复调性”：“作者对主人公所取的新的艺术立场,是认真实现了的和彻底贯彻了的一种对话立场,这一立场确认主人公的独立性、内在的自由、未完成性和未论定性”^[10]。如果说在《头发的故事》中与N先生对话的主体的另一面“我”一直沉默不语,不参与和评价N先生的言语,而使N先生的言语成为对话者“不在场”的“独白”的话,那么在《幸福的家庭》《在酒楼上》《孤独者》三个文本中,主体两面直接对话,我们发现,对话进程依然经常中断。《幸福的家庭》将主人公“他”一分为二:一个是被窘迫、困顿包围的现实生活中的“他”,另一个是理想化的创作中的“他”。曾经“决计反抗一切阻碍”、追求个性与爱情自由的“他”将创作中的家庭营造得极致美好和理想化,但现实的另一个“他”又常常打断和反讽着创作中的“他”,使挣扎于现实与理想中的主体疲于应付。身心疲惫的主体最终掐断了两者的较量和抵牾,随着主人公将创作的稿纸揉成纸团掷到纸篓里,“他”回到现实中来了。现实中的主体与理想中的主体对话的中断现象表明,只是乌托邦幻想而没有现实性的思考是不真实的。《孤独者》中的魏连受和“我”也有很大的不同,用魏连受的话来说:“但我想,我们大概究竟不是一路的”。这种不同性是造成“复调性”对话的重要原因。“我”和他谈“孩子”话题的时候分歧就产生了:他的观点是孩子根性是好的,如果变坏也是环境的因素,而“我”的观点是孩子本身就有坏根苗。这种分歧导致了魏连受的不快和无语,他“气忿了,只看了我一眼,不再开口”。“我”也猜不出他是无话可说呢,还是不屑辩,只是默默地连吸了两枝烟,结果“待到他再取第三枝时,我便只好逃走了”。魏连受体现了由内到外的妥协的悲剧,鲁迅曾安排了一次“我”当面劝说他的机会,“……你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你应该将世间看得光明些。”他把话题引入祖母的一生,其实是放弃了探讨和反省自己精神危机问题,尽管他与祖母的命运有某些相通之处,但祖母的寂寞来源于由外向内放弃的精神向度,所以随着对话的进行和对话长度的延长,他们对话要探讨和直面的问题就越来越被遮盖。“我”最后用“走”的方式开启与魏连受不同

的人生道路。《在酒楼上》的“我”与吕纬甫曾经是志同道合的朋友,现在的“我”的心绪却变得“懒散”、“索然”、消沉了,其意态泛出了灰色,与吕纬甫现在敷衍、颓唐的精神状态很相似。但从其对话中明显能读出两者的区别,“我”是作为吕纬甫精神状态和思想道路的审视者、批评者而存在的。对于他“绕圈”的人生定位,“我”的回答是“这难说”,听完他两件“无聊的事”后,“我”就发问:“你教的是‘子曰诗云’么?”“我实在料不到你倒去教这类的书……”可见,两人的对话不是停留在“同病相怜”或“相对唏嘘”的层面。两句问语透露出了“我”对他所走道路的不认同。看着吕纬甫的眼光“又消沉下去”,“我”对其便“没有话可说”。由于人生的道路选择相异,使得我们之间的对话难以通约和融合,最后不欢而散,各走自己的人生道路,“我们一同走出店门,他所住的旅馆和我的方向正相反”。

不管是相异话语对话的“中断”还是相同主体两面对话的“不融合”,都留下了丰富而开放性的话语空白。这种对话的“未完成性”的好处在于:对话时段的戛然而止,使文本意义结构由历时性的线性脉络变成一个开放式的共时网络,更有利于鲁迅在当下共时语境中抒发自己的主观情感和参与社会讨论。落实到鲁迅的小说中,这种话语空白的背后深藏着鲁迅对“立人”和“启蒙”工程的理性反思,对话时段的“未完成性”既表明国民之间普遍存在的“沉默”和“无声”的隔膜状态,又反映了主体自身存在着诸多矛盾因素。这种清醒的认识是一个理性的作家必须具有的,在这样一个“主—奴”文化空间里,对话越受挫就越没有声音,越没有声音也就越没有摆脱轮回命运的可能,当然更不用谈进化光辉的普照了。

三 时空交互与现代启蒙实践的出场

时间和空间是不相离析的一对范畴,时间和空间交织成人的此在。卡西尔曾经说过:“空间和时间是一切实在与之相关联的构架。我们只有在空间和时间的条件下才能设想任何真实的事物。”^[11]鲁迅的小说对空间的体验非常深刻,其意义的扩充本源于空间对时间的作用关系。鲁迅把重复的因素放在一个故事或一个情节的开头和末尾,使这个重复因素起着戏剧开场和结束时幕布的作用。这种首尾对照和重复的方式革去了时间的客观属性,纯粹以人的内在感觉为基础呈现空间形态。对此,

我们不妨以具体篇什为例来印证:《明天》以“鲁镇是僻静地方,还有些古风:不上一更,大家便都关门睡觉”开篇,又以“这时的鲁镇,便完全落在寂静里”结束。《风波》被封套在鲁镇土场上前后两幅“无思无虑的田家乐”的恬静风光画中。《祝福》中祥林嫂的人生悲剧定格在鲁镇毕毕剥剥、连绵不绝的爆竹声中。《示众》以“热的包子咧!刚出屉的……”开篇,以“热的包子咧!荷阿!……刚出屉的……”结尾。《孤独者》以“送殓始,以送殓终”为时间线索,其中“受伤的狼嚎声”贯穿始终。通过重复功能的运用,抹平了过去、现在、将来的界限,线性流动的物理时间为循环式的空间化时间所代替。

对于下层庸众而言,空间对其时间意识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空间使日常物理时间停滞,“现在”时间被吞噬。美国学者威廉·莱尔曾经总结出鲁迅小说结构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故事开始时,种种人和事纷至沓来,进入行动;故事结束时,又回到原来的静止状态。”^[12]读鲁迅小说,我们发现其首尾构成一个密闭的空间系统,时间的方向感和流动感不明显。《示众》中“看”与“被看”的场景没有时间性,而只是空间性。结尾只是开头的直接的回归形式,似乎小说所描写的事件并没有占有任何的时间。“看者”到最后依然对“被看者”一无所知,表明了主体意识虚无背后的无时间性流动,只有空间位置的呈现。《明天》中三次写到纺车静静地立在又大又空的房中,隐喻了单四嫂子内心的空荡与孤寂,往日儿子围着纺车跑,现在儿死车停,生命的纺车不再转动,时间意识也就停滞了。《故乡》中“我”的离去,并没有太多意义,“我”和闰土的去故事,还在后辈的宏儿和水生中继续循环和延续。与祥林嫂、单四嫂子等懦弱女性不同的《离婚》中的爱姑是一个有反抗意识的女性形象,她决定离婚的原因是自己的丈夫姘上了小寡妇,不要她了,公公又只知道帮儿子,她大胆泼辣,口口声声称丈夫为“小畜生”、公公为“老畜生”,甚至对封建政权的代表人物“七大人”她也敢加以评议,说:“七大人怎么样?难道和知县大老爷换帖,就不说人话了么?他不能象慰老爷似的不通,只说‘走散好,走散好!’”但爱姑一进七大人家的门,心已虚了,她“局促不安起来了”。七大人玩“屁塞”,这个小道具虽然有故弄玄虚之嫌,但其作用不可小觑,它增加了神秘感,强化了七大人的威严。最终爱姑就在这样的氛围中自动屈服了。小说写道:“两方面各将红

绿帖子收起,大家的腰骨都似乎直得多,原先收紧着的脸相也宽懈下来,全客厅顿然见得一团和气了。”甚至于爱姑也心平气和地对慰老爷说:“我们不喝了。存着,明年再来喝罢。”“是的,不喝了,谢谢慰老爷。”此前的唇枪舌剑最终转化为此刻的其乐融融,女性的反抗意识也被消泯和中断了。借助这种首尾呼应,叙述者追述既往之一切,旨在表明:一切本质上依旧不变,时间从社会进程中抽离出来,被悬置和吞噬了,成为循环回复的生存隐喻。

而对于文化反抗者而言,空间对其时间意识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在空间的包围中,呈现出“非成长”的意识倾向。由于个体(主体)力求在时间历史进程中获得具有主体性的空间“位置”,由此,空间上的“包围”与“被包围”就形成了。位置感的追求隐含着主体在“空间”方面的诉求以及在时间中自我归宿的寻找和反思。位置不同决定了空间的具体状况,对位置的想象和描述,给空间定位提供了话语条件。“19世纪以后的空间图示:它的核心在于,基地(即 site)只有在同别的基地发生关系的过程中才能恰当地定位。一个基地只有参照另一个基地才能获得自身的意义。”^[13]两个“基地”的位置关系构成了具有权力关系的“场域”。这种理论为探询鲁迅小说的时空关系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有论者认为:“鲁迅引领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思潮,取决于浙江作家对世界文学新潮的敏锐感知与把握,也根因于积淀深厚的地域人文传统对现实主义的精神呼应。”^[14]正因为“庸人”和“猛人”思想的不相容性,他们的空间位置关系便演变成“包围”与“被包围”的关系,这种空间关系不是简单的“看”与“被看”,而是一种“包围”与“突围”的权力对峙。由于对病态社会认知的不同,导致了两种人的隔膜与分野。“文化反抗者”曾有过短暂的“外突”行为,但最终还是在现实中被“归化”和“驯化”:《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从感情炽热、斗志昂扬的改革中国的激进者(“到城隍庙里去拔神像的胡子”,“连日讨论改革中国的方法”,“教授 ABCD”)变为“敷敷衍衍”、“模模胡胡”、“随随便便”的沉静、颓唐者(“教授‘子曰诗云’、《女儿经》”)。那个“绕圈子”的比喻正是这一类人命运的集体写照和概括。《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在社会和自我的双重驱逐下,最终做了杜师长的顾问,他是这样界定自己的一生的:“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拜,所主张的一切”。“现

在”与“先前”相比,不是进步、发展了,而是退化、落伍了。《药》中的夏瑜因为说了“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被大家认为是“疯了”,并被关入牢里,最终被刽子手杀害,而他的血成为别人的“药引”,吃进肚里,“却全忘了什么味”。他的坟旁特别冷清,陪伴他的只有缩着头的乌鸦。夏瑜的死表明这个“文化反抗者”最终无害化了,旁人用遗忘的方式集体挥霍了他生命的意义。

鲁迅小说空间意识的深刻性在于,在用进化眼光观照人生时,鲁迅认识到了启蒙的困境。他敏锐地看到了由国民自我搭建的空间秩序,这阻碍了自我的发展也限制了启蒙的延展。因此,“攻打病根”“撕去假面”“活画出一个个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呼应了其进化理性和对人的重新塑造(人格的自我塑造与人格的被塑造)的要求。鲁迅的启蒙要完成“自我启蒙”和“他者启蒙”两项使命,其先后顺序是由“自我启蒙”再到“他者启蒙”。因为只有启蒙者的思想、意识、话语足够先锋和现代,才能对别人的思想进行指导。遗憾的是,在中国,“自我启蒙”并未形成主导潮流,主体未能解决自身观念中的矛盾性和分裂性。在鲁迅的小说中,作为启蒙者代言人的“文化反抗者”身上或多或少地有很多的矛盾性,如过去的纠葛和现实的反抗、启蒙的热望与言说的困境等,这些都让他们陷入了启蒙的困惑之中。

假设“自我启蒙”已经实现了,那么“他者启蒙”能否实现呢?答案是否定的。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由于接受者(启蒙对象)对启蒙者和新思想的隔膜、偏见、不信任,对民族“新生”的道路茫然无从措手,导致启蒙的结果是“失语”“失效”“曲解”。鲁迅曾在给许寿裳的信中不无遗憾地写道:“吾辈诊同胞病颇得七八,而治之有二难焉:未知下药,一也;牙关紧闭,二也。牙关不开尚能以醋涂其腮,更取铁钳摧而启之,而药方则无以下笔。”^[15]另一方面,启蒙者也保持着与被启蒙者之间的距离,在启蒙者对被启蒙者进行意义赋予的时候,“双向隔膜”就产生了。如果说起初的“狂人”“疯子”、N先生、夏瑜等人还有对庸众的劝转、呐喊、讲解等启蒙热望的话,那么后来的魏连没、吕纬甫、涓生、子君等人与庸众的距离越来越疏

远。他们不再有主动唤醒庸众进行“他者启蒙”的意愿,连冷嘲热讽的激情都失去了,而是将审视的目光指向自我。他们的“孤独”使得与被启蒙者的距离越拉越远,“他者启蒙”的目标也只能搁浅。于是,从“他者启蒙”又再次转向“自我启蒙”,这种启蒙的“内视”表明鲁迅启蒙思想走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 [1] 鲁迅.“碰壁”之后[M]//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76.
- [2] 鲁迅.忽然想起[M]//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5.
- [3]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李康,李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206.
- [4] 鲁迅.通信[M]//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1.
- [5] 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108.
- [6] 露丝·本尼迪克.文化模式[M].何锡章,黄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2.
- [7] 申明秀.鲁迅“破”及“立人”思想探析[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
- [8] 汪民安.福科的界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7.
- [9]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83.
- [10]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M].白春仁,顾亚玲,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93.
- [11] 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54.
- [12] 乐黛云.国外鲁迅研究论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334.
- [13] 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02.
- [14] 王嘉良.地域人文传统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论“浙江潮”对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思潮的引领意义[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 [15] 鲁迅.致许寿裳[M]//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57.

责任编辑:黄声波